

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

■ 昌切 著

众声喧哗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面对众声喧哗的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对话也许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应对方式。对话涉及人文精神的讨论、知识分子的分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新保守主义的出现、文学的多极化趋势、文学批评的失据、诗歌尴尬的境遇、网络文学的“横空出世”，有清理，有分析，有评价，多少能够反映出参与对话者应对的立场、态度和见识。对话既是一种批评形式，也是一种批评精神。这种精神多少也能够从文学批评和书评中体现出来。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

■ 昌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 / 昌切著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11. 11
ISBN 978-7-307-09248-8

I . 众… II . 昌… III . 社会科学—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114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 1000 1/16 印张:21.25 字数:301 千字 插页:2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248-8/C · 293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学会说话（代前言）

先得声明：在写下这个题目之前我已经说过数不清的话了。在大学的课堂里说，在各种研讨会上说，在各种报纸和刊物上说，说文化，说思想，说历史，说文学，说理论，说批评……说东道西，冠冕堂皇，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然而，扪心自问：说来说去，都说了些什么呀？

“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说”，“康德说”，“黑格尔说”，“海德格尔说”，“福柯说”，“德里达说”，“杰姆逊说”，“萨伊德说”，“威勒克说”，“利奥塔说”，“哈贝马斯说”，“布尔迪厄说”，“孔子说”，“老子说”，“庄子说”，“胡应麟说”，“李贽说”，“鲁迅说”，“李泽厚说”……这一切“说”都是他人的“说”。经过我和他人的口说出的这一切，不管带不带引号，都肯定不是我和他人的“说”，我和他人所说的，说得好听点，不过是对先哲贤所说忠实或变相的转述，是征圣宗经载道，正应了老祖宗的规矩。我不是说先哲贤说过的话我和他人就不能说，而是说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人在说，以谁为主，如何说，在引述先哲贤的话时如何说出自己的一点

道道来。他主我仆，重复或变相复述先哲贤说过的话，不过是做了先哲贤的传声筒，即使说了一大堆，说得再动听，也等于白说。

天上飞过一群大雁，每一只大雁都在发声，您辨得出哪种声音是哪只大雁发出来的吗？我料想您辨不出来，因为一群大雁只能发出一种和声。问题是：我是不是其中的一只大雁？如果是，那么您肯定听不出我的声音。如此说来，我倒宁愿做一只发出凄凉哀音的孤雁，而不愿意混声于一个美丽的雁群。

当然，我不是大雁，这个比喻也未必恰当，用不着较真。但我敢承认，我曾经无数次地充当过他人的传声筒或复印机；我也敢断言，在我国论坛，有相当多的论者充当过他人的传声筒或复印机。传声筒好说，不说它，倒是复印机有点说头。有两种复印的方法：一是袭用他人的理论、观点、思路、方法乃至文字；一是从这儿截个头，从那儿取个身子，从其他什么地方借双腿，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新人”。前一种方法过于笨拙，不够光明正大，别人干没干过我不大好说，反正我不愿干也确实没干过；后一种方法很“内秀”，很含蓄，很机灵，很吸引人，我不愿干但确实在不知不觉间干过，尽管我干得极为艰难，还满以为是在干别人从来不曾干过的事。

好像是列宁说的：“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这话我信，比喻真的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写学术、批评文章。想当年，章太炎为论证一些重大论题，经常挖空心思弄出些奇喻妙譬，粗看还不免为之喝彩，细想则觉得多是些无稽、无际涯之言。譬如他为了证明个体比国家更为重要，便把个体比作手，把国家比作双手交叉，他说：手真，有“自性”，双手交叉假，无“自性”，双手交叉是手之所为，手比双手交叉重要，所以，个体高于国家。同时他又把个体比作金子，把国家比作用金子制成的饰品，进而论定：个体比国家高贵。章的论点本来是对的，可经他这么一论，反而把问题弄复杂了。我知道设喻取譬的局限，不过我只是想借此说明：至少在批评界，我还仅仅是一个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还不能顺畅地说出属于我自己的话来，或者干脆点说，我还不会说话，所以要提醒自己学

会说话，从学术、批评的 ABC 做起，争取发出一种不仿效他人、他人也无法仿效的个人的声音。看看，又来了跛足的比喻。

近来常与人谈起匿名或无效写作的问题。我认为一切无我的写作都是匿名或无效的写作。无我不是无个性，而是没有独一无二的我，我写的文章可以署上他人的姓名。谈到这个问题，我愿意检讨我乃至我们惯用的说话语气。试想想，说起作家作品和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我们说话的语气，是不是听起来就像官员的或权威的、裁判的或教员的、医生的或奶妈的、臣子的或小孩的……总之，都是代言人和“拟言人”的语气，惟独缺了自个儿的语气、真正的批评家的语气。说事从不由己入事，由事析理，由理明事，而动不动就端起一副大架子口出指令、训示、警告，动不动就引来古今中外的大人物、风云人物的“圣旨”大语，动不动就亮红牌黄牌，动不动就教导人家应该怎么怎么写，动不动就来个甲乙丙丁、ABCD，动不动就诊断他人的这病那病，动不动就抚着拍着地哄，动不动就撒娇媚上媚雅媚俗……

笔者忝列批评界，搞过一点批评，难免染上这些坏毛病。现在我懂了，批评根本就不是这么个搞法。拟、代他人发言，有什么意思？杰姆逊说的就是杰姆逊说的，孔子说的就是孔子说的，你去说就得从中说出你的话来。拟言体、代言体的作品，就是做得再漂亮，也是无我的东西。

批评是一种理性活动，完全有必要“从我做起”。从我做起的批评必定具有相对性。可我们这里的批评界容得下相对性吗？很难说。我自己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理解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理解这种相对性。说起话来，动辄以真理在握自居，满脑子绝对、同一、本质和终极，经常端起一副普遍论、独断论和决定论的大架子，大大咧咧地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无往不胜。惯用的句式，不是命令句就是祈使句，除了斩钉截铁的判断句还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句。逮住谁都能评，评谁都能评出个所以然来。话总是说得满满的，不留余地。

不久前为《作家报》写了一篇文章，谈的是批评的相对性问题，在这里我想重申一下我的看法。

我相信，相对性是 20 世纪人文精神区别于 19 世纪的一种基本特性。像埃舍尔的“怪圈”，哥德尔定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荒诞派戏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等，都能完满地体现这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玄思冥想的产物，与庄子式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毫无关系，为它打底的是 20 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影响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世纪初的物理学新思想告诉我们：概念并不永远、绝对有效，不合适了随时可以改变；知识是相对的，不合适了随时可以修正；科学的某些基本原理是约定的，不合适了随时可以抛弃；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合成四维时空，对时空的测度随观察者转移，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一句话，人类理性不是万能的上帝，有其先天的局限性、自悖性和相对性。

批评界绝对不应该盛行包打天下的绝对性批评。以前倒是有过，而且十分盛行，但那样的批评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没有必要去管它。所有的批评都有它的基点、立场、理论和方法，都有它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不存在哪一种批评至尊至大而有权统驭和吞并其他批评的问题。只要是有点模样的批评，不论是谁的，都应该是个人的，都不应逃出相对性的牢笼。我对他人的批评同样逃不出这个牢笼。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我”字。批评者是我，被批评者不是我，我、他再怎么接近也不可能完全重合。更何况换一个人评，就能评出另一个他来。

有我无我是大不一样的。有我，怎么引古人洋人的话都不失我；无我，则可能说的全都是古人洋人的话。我生活在现在，我不是古人或洋人，这是基本的事实。我只能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说话。现在不仅是我言说的本，而且是我言说的语源、起点和归宿。身在规定思在和言在。身在的需求即现在的需要，而不是古人或洋人的需求，所以不能对古人或洋人唯命是从。身在是我的身在而非他人的身在，所以我作为个体不必屈从于“群体话语”。

然而，我又不是绝缘体，我的身和思离不开古人和洋人，我的言离不开我所属的语言共同体，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可能落入他人的言筌。因而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不薄古人、洋人，不拒绝群体

话语，以现在为基点，从现在的需求出发，融古为今，融西为中，使古代和西方的文化资源“现在化”，尽可能在群体话语中辟开个体的言路。

原载《粤海风》1998年第3、4期合刊

目 录

学会说话（代前言） / 1

问答和对话

关于新生代的一份答卷 / 3

选择回答“批评家档案”十三问 / 8

热点文学五人谈 / 12

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可能性 / 25

人文流向与个人精神立场 / 36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 50

诗歌的当下境况与个人化写作 / 63

《柏慧》与90年代精神境况 / 73

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 / 85

珞珈代有才人出

——关于武汉大学作家群的对话 / 110

全球化与文学期待 / 125

网络文学：黑客还是新军 / 138

文评和书评

情欲极化法

——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一种方法 / 151

- 《金光大道》重版，好 / 156
传统·先锋·精神指向
——刘继明小说创作辨析 / 158
从《桃花源》看隐逸精神的复活 / 161
初识诸种旗号 / 165
排座次 / 168
不可过分迷信定论 / 170
王朔的转向 / 172
文学的两极分化 / 174
忌大戒空
——文学批评反思录 / 178
非成人化 / 181
《长江文艺》1994年小说读后感言 / 186
在困境中突围
——“’95长江文艺优秀小说”读后感 / 191
血性之诗：邓一光小说的人格魅力 / 194
可疑的新生代 / 204
学界追星族 / 209
虽为女流，堪称大砍 / 211
把东西拆散以穷根究底
——读《霍金讲演录》 / 213
理趣盖住情趣的韩少功 / 215
孤苦无告的村庄
——《失语的村庄》的一种读法 / 217
对“现实主义”前景的一种推测 / 221
行文处处见“学问” / 224
相对性与对话批评 / 227
二张简论 / 231
文浪的“浪” / 238
呼唤人道
——评徐世立的《儿科医生》 / 241
惜名的张执浩 / 244

- 张执浩的诗性叙述 / 252
随便翻翻 / 255
文化膨胀 / 259
“我”在哪里 / 261
窜了位的批评家 / 263
武汉的都市文学 / 265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2000年长篇小说创作回眸 / 268
二战反思录 / 272
诊所里的批评 / 274
知识背景与湖北文学 / 277
逆向思维与反世俗成见
——评王石的小说集《不可告人》 / 281
《语言学与小说》译序 / 284
启蒙叙述的一个样本
——评何锡章《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 / 290
洞见与盲视
——评《灵魂之旅》 / 295
文学批评与思想性 [附录]
——与昌切先生讨论哲学问题 / 300
高屋建瓴 通观微至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略评 / 306
历史是转盘吗
——评曾纪鑫的《拨动历史的转盘》 / 309
文学转型与小说创作潮流
——《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评析 / 313
当代戏剧命运的文艺生态学审视
——评吴济时教授的《文艺生态运动与当代戏剧》 / 320

后 记 / 326

问答和对话

关于新生代的一份答卷

问卷人：张 钧 答卷人：昌 切

问：你认为新生代这么一个写作群体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如果是真实的存在，你是怎样定义它的？

答：如果从经过简化的认知范式入手，着眼于代际文化积层的差异，纵向考察不同年龄层的作家的创作，可以说存在一个新生代。问题是迄今为止评论界对于新生代所作的种种解释都不尽如人意，经不起证伪，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举出一些确凿无疑的反例来。无论是以年龄还是以性质作为划代的标准，或者说，无论是把这个写作集群称作“60年代人”还是“新世代”，都会遇到无法排解的解释困难。几年前我为《羊城晚报》写过一篇题为《可疑的新生代》的文章，就明确表示过对新生代这个提法的怀疑。

在我看来，新生代是60年代出生、八九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个特殊的写作集群。（也应该包括个别50年代出生的作家）总的来说，这个写作集群在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和写作方式等方面都与“五四”以来的各代作家大不一样，已经摆脱了先前最为流行的革命叙述和启蒙叙述两大叙述范型，也就是说，脱开了“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传统，开始追求艺术世界自身的独立性和叙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开创了一个小说写作的新生面。

问：新生代的写作有无深度模式？它是否像有的批评家所言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平面化、碎片化或者游戏化的写作？

答：新生代的写作并不缺少深度模式。张钧先生访谈过的作家如刘继明、徐坤以及余华、陈染等人的作品就有深度模式。

平面化、碎片化或游戏化只能用来指认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部分

作品，例如 80 年代后期格非、余华、苏童、北村和孙甘露诸位的某些作品。

问：新生代作家有无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拒绝理想的写作吗？

答：新生代作家不仅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且有非常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愿望。他们有意规避集体经验和为主流文学界所认可的公共话语，刻意在叙述语言上玩花样，使之“私密化”……就是其价值取向的体现。“玩文学”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取向呢？

新生代的写作很难说是一种拒绝理想的写作。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理想。理想不等于信仰，与绝对、神圣和唯一无关。

问：新生代写作是以个人化的叙事来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吗？你怎样理解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仅仅是一种局限于“个人”或“私人”的写作吗？

答：个人化叙事的确是新生代写作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个人化叙事必然会导致叙述语言的“私密化”。“私密化”决不意味着弃绝公众或写作者所属知识共同体的经验，正如个人化根本就不可能与他人经验的世界完全隔绝一样。任何语言都少不了可交际性和可传达性。胡言乱语不也是人们在语言交际和语言接受中作出的一种判断？林白和陈染的写作该是够个人化了吧，可是她们作品中的个体意识和女权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不也来自于早经沉淀的公众经验？

问：你认为新生代的精神来源是西方文学中的个人意识还是本土意义上的某种精神遗产？新生代的写作与第三代诗、王小波的写作有无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答：西方文学或者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无疑是新生代的一个重要精神源泉，但并非唯一的精神源泉，另一大精神源泉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除非新生代作家全都不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痞”（佯狂、毁弃一切等“流氓”行为），“玩”（搞文字游戏）和走极端等等，在新生代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新生代的写作与第三代诗联系非常紧密。有的新生代小说家原

就是第三代诗人中的重要人物，如韩东。韩东的某些小说，例如《新版黄山游》，毋宁说就是他的“平民诗”的翻版。

王小波是启蒙理性的坚守者，他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的人文立场，他继承的是“五四”文化传统，与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大相径庭。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相似点的话，那也是“西化”倾向这种表面的东西。我认为，最好不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寻找精神上的差异上面。

问：文坛上是否存在一个新生代批评群体？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的批评策略是否如葛红兵所言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批评策略？
(注：第六个至第十个问题专门向批评家提问)

答：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文学论坛上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生代批评群体。这个批评群体在理论资源、文学观念、叙述策略和语言方式等方面都与80年代的青年批评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更早的批评家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用相对主义来概括新生代批评家的批评策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批评策略？假如是，那么到底该怎么解释这种概括的有效性？我一直认为相对主义是90年代中国文化或文学的一个特质，但是不是一种批评策略，我觉得是很难说清楚的。作为一个批评家，要想使自己对文坛的发言真正生效，恐怕是不宜提倡和采用什么相对主义的策略的。

问：你认为新生代的写作相对以往的写作是一种断裂式写作还是一种转换式写作？新生代是否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叙述空间？他们的写作具有革命意义吗？

答：我不知道断裂与转换的实质区别在哪里。断裂式的写作岂不正是转换式的写作？我想设问者设定这两种写作方式，着眼点在新生代的写作与以往的写作的区别与联系。要是我的推测不错的话，我想这两种写作方式都是存在的，这取决于它们所针对的对象。就针对革命叙述和启蒙叙述而言，新生代的写作是断裂式的；而针对80年代前、中期的写作而言，新生代的写作又是转换式的。

问：你怎样评价1998年5月至6月间朱文、韩东等人发起的名为“断裂”的问卷活动？你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哗众取宠的炒作

还是一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艺术行为？

答：朱文和韩东等人的“断裂”问卷活动已引来了许多议论，我不想重复这些议论。我认为他们是自断退路。这个意思前不久我向葛红兵说过。你看他们提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如何看待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怎样看待《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怎么评价以前的作家作品，等等，大多数都是冲着主流文学去的。这说明，在自觉地“边缘化”以后，在靠“边缘化”写作获得“小圈子”的声名以后，这些作家已不甘忍受身处边缘的冷寂，要向文学的“中心”讨一个说法，为自己打打气，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坚定自己写作的信念。这是一次集体的示威，作用想必一时半会是不会大的。一切都有赖于时间，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断退路呢？也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不是自断退路呢？想想看，他们还回得去吗？即使想回去也没办法回去了，回去就等于自我否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朱文他们的问卷活动不是哗众取宠的炒作（理由见上），也不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艺术行为（理由同样见上）。据说这个事件与“马桥风波”一样，背后是有文章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就有些“做秀”的意味，被人当枪使了。不过，我倒宁愿把它看成部分新生代作家自断退路的行为。

问：所谓“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是文坛炒作的结果吗？他们的写作是一种矫饰主义的表演还是对灵魂和肉体的真诚书写？

答：不能说“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的“出道”与策划和炒作毫不相干。“70年代人”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从总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写作还不大稳定，写作样式不一，先锋色彩似乎远不及上述新生代来得浓重，似乎还谈不上成“群”成“派”。

“70年代人”的写作，有的有“矫饰主义”的嫌疑，有的有裸露灵魂和肉体的倾向，不好一概而论。但是，他们的写作已呈现出某些新质，值得继续观察和作进一步的研究。

问：你认为新生代作家的前途如何？他们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学最大的启示应该是什么？他们致命的弱点呢？